

阿尔都塞反动言论大合集（2025 年版[最新修订版]）

编者：25/點，凌云×志見。

感谢本合集中收入内容的所有翻译者，本文禁止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本合集整理了所有已知的阿尔都塞的中文官方译文与民间译文中的反动言论，本文的编者完全不认同本文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本文全部内容不代表编者立场，整理本文是为了让马列毛主义同志看清阿尔都塞的反动本质并避免受到西马的迷惑！

阿尔都塞主义者抨击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是“不学无术之徒”，认为他们没有认真读过阿尔都塞就乱批判阿尔都塞，但实际上，本文编者自觉完全有权编辑此文集。本文编者认真读了三年阿尔都塞，看了他中文界已知的所有译文甚至包括所有文本注释（从出版时间至《战俘日记》，包括台出版的《自我批评论文集》和《自我批评论文集（补卷）》，还有如又杉、汪砥和运社等用户的所有已公开的民间译文，以及暂未出版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与帝国主义》等文集的民间译文），无论阿尔都塞主义者们（即使他们可能不承认这一称呼，把这视为一个纯粹意识形态因而是非科学的称呼）是因为其影响力还是因为其真诚的品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前途的忧虑或者其他别的什么理由而去喜欢或支持阿尔都塞，我们都不承认那就是可以肆意践踏马列毛主义尊严的原因。

《最后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唯物辩证法是苏联科学院发明出来的错误理论，只不过用‘物质’取代了黑格尔的‘精神’或者‘绝对理念’。”

“辩证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只会像‘橙色的对数’一样荒唐。”

“是恩格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除了他在劳动价值论里玩的辩证游戏以外，马克思并没有讲过多少关于辩证法的东西。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态度，只有这句话：尽管辩证法常为权力服务，它也可以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一旦我们把辩证法看作‘规律’，它就要么是保守的，比如恩格斯，要么是虚伪的，比如斯大林。只有当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时候，它才是珍贵的。所以并不存在什么辩证法的‘规律’，就像不存在历史的规律一样。这两种规律都是荒唐的。辩证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被某些规律控制和规定的进程，好像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就足以推动历史的进展。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首先就要抛弃历史是被规律所掌控的观念。”

“唯物主义不应被发展成哲学体系，任何成体系的哲学都不该被称作唯物主义。即便我们可以在唯物主义的哲学之上建立一种体系，但这不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代表了一种哲学立场。”

“马克思把自己的科学发现支撑在了一种哲学，也就是黑格尔的哲学之上，但我们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与其说是帮助了马克思，不如说是成为了他的障碍。总之，我不能把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和马克思使用的哲学等同起来。马克思其实没有明白他在科学研究过程展现的那种哲学，因此我们就要给予马克思一种哲学，好让我们理解他在资本论中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思想。”

《访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我成为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是天主教徒，我没有改变宗教，深层次上说我仍是天主教徒。”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存在，它也不可能存在。”

“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一名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我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因为无政府主义超越了共产主义。”

“我想说，马克思以一种不可能的方式，不义地，对待无政府主义者。”

“你怎么能像马克思对巴枯宁一样侵犯人，像那样不尊重人呢？”

“你得给国家另一个定义，不同于马克思给出的经典定义，因为马克思不懂国家。的确，他理解（国家）是支配阶级的工具，这是对的，但他一点儿也不理解国家的功能，或者，让我们这么说，是国家的空间。”

《局限中的马克思》：

“博学的‘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价值理论是一个神话，剩余价值理论是无效的，因为它在数学上是‘不可量化的’。”

“马克思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中”

“马克思经常以这种革命和唯心主义的精神构思‘过渡’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下一种……）？”

“斯拉法是移居英国的葛兰西的老朋友，斯拉法和他的学派有一个优点，就是密切关注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证，并且非常吃惊地发现，这个论证是错误的。这事一个走的太远的错误：恰恰是来自这样一个原则，即必须从最简单的、第一要素即商品或价值开始，而简单的东西既不简单也不最简单；还来自这样一个原则，即绝对必须从‘分析’模式开始，它的任务是在简单的东西中发现其本质和这种本质的效果，这些效果适合于通过综合推理最后找到具体的东西本身。马克思自己打破了这一要求，他不仅在引入《资本论》论述顺序的具体章节中，而且通过引入抽象概念，他从未停止过将这些概念插入抽象论述顺序的理论领域，以扩大它，从而表明自己，感谢上帝，这很可能地不属于黑格尔。”

“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说明马克思由于把价值的抽象化强加给自己的强行开始而使自己陷入的困难和矛盾之中。例如，价值（究竟是什么价值？）通过劳动能力的‘使用’从生产资料‘传递’到产品的棘手问题，以及著名的极限情况，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依据是，假定C，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可以是零（=0）。例如，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马克思在这里陷入了推理的错误，等等。”

“然而，至少应该指出马克思的理论缺陷，他的缺陷跟他的优点一样，是种无人问津的奇特。”

“国家、意识形态、政治、党、工人运动中的理论和政治人格：马克思有这么多‘绝对局限’，为了认真反思，有必要好好注意一下。”

“问题是要尽可能准确地评价马克思通过关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理论’指示留给我们的东西。在这种关系上，在权衡了一切之后，我们必须说，从政治角度看，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和基本的指示，但相反，从理论角度看，他给我们留下了不足。”

“恩格斯将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试图勾勒出国家诞生的理论，但这是一部汇编的作品，很难令人信服。”

“问题在于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当他谈到这个问题时，他经常这样做，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他是对的——俄国革命大戏的核心。列宁，就像马克思一样，虽然非常清晰，但却在两种概念之间摇摆不定：第一种在我看来是公正的，因此必须承认；第二种，在事态的压力下，他越来越倾向于第二种，而我认为它是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定义就是把专政一词理解为政治意义上的专政，确切地说是政治制度意义上的专政，也就是说，是人的政治政府，它‘在法律之外’行事，因此，它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并把暴力和专横的意志强加于人。无视法律，对人恣意施暴（不为阶级或政党服务），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的暴力（也是超越法律的暴力）之后，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的专政政府的暴力，似乎与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因而也是其本质所固有的。既然革命只能在反对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既定法律的情况下进行，因而也只能通过暴力手段进行，那么，为了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秩序和建立革命国家，随后建立的、承担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革命国家任务的政府，自然会与这种暴力保持明显的连续性，而且必须如此。这就是在这个概念中联系在一起的命题的‘逻辑’。但它们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成立：那就是专政这个词的含义，它指的是在任何

既定的法律之外，通过法令和武力进行统治的暴力政治统治政权。列宁在他的许多文章和演说中都屈服于这种‘逻辑’。”

“在马克思的公式中，再生产的维度，国家的职能，被微不足道地简化为干预的职能，在局限上简化为残暴的职能。”

“马克思第一次暴露自己，谈论‘虚幻的’话语，而且必然是虚幻的话语，也就是说，具体地面对法律、国家和我们应该称之为(由于缺乏更好的名称)意识形态的现实，马克思就失误了。他之所以失误，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失误了。而最严重的原因，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是‘调戏’了黑格尔的术语，而是陷入了资产阶级法学意识形态关于价值本身的观念，陷入了他谈论价值的方式，陷入了一开始就谈论价值以便从中推论出一切的方式，而没有能够摆脱这种观念。”

“在马克思和列宁身上存在着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空白：一方面是关于国家，另一方面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组织。”

《保卫马克思》：

“恩格斯把这些形式以及它们的本质和作用一笔带过；却只研究它们的结果，即可被忘记的和不可思议的细微事件，这究竟为何道理呢？更进一步说，这种把上层建筑的形式降低为无数细小的偶然事件的做法，难道不是与这些形式的真正职能和认识论职能绝对矛盾的吗？”

“所谓上层建筑的形式的效能‘分散成’无穷无尽的微观结果（不可思议的偶然事件），这种说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性质的观点。”

“我想仔细研究的是恩格斯的论证。粗粗地看，他的论证十分完美地实现了公式和对象的协调一致。但仔细一研究，事情又如何呢？那只是公式和对象的暂时协调；而在暂时的此岸和彼岸，协调就是一个没有得到求证的假设，而替代协调的就是不确定性，从认识的观点看，也就是空白。”

“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把两种类型的解释搞混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涉及单个的意志时，恩格斯的论证十分清楚和协调，而在单个的意志的此岸和彼岸，论证就变成空洞无物或同义反复？”

“某个事件之所以成为历史事件，这并不是因为它是个事件，而恰恰是因为它具有历史的形式和历史事实的形式（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形式），这些形式同恩格斯在放弃其原来的公式时所采用的关于无穷无尽的结果这个不恰当的公式毫无关系，它们是完全可以被认识和被确定的（马克思反复说过，历史形式是可被认识的；在马克思以后，列宁也用经验科学，即非哲学的科学，证明了这一点）。 ”

“但是，当某一门学科从另一门学科的范围出发，从一个不能构成任何科学知识的范围出发（以我们讨论的问题为例，就是从无穷无尽的情况出发产生个人意志，从无数个平行四边形出发产生最后的合力），企图产生出自己的对象及其相应的概念，这一学科就势必陷入到认识论的真空之中，或者被误认为处于哲学的充实之中。这就是恩格斯在他致布洛赫的信中的立论尝试的命运。人们而且可以看到，在这里要区分认识论的真空和哲学的混乱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完全是一回事。”

“为什么在恩格斯身上，人们除了看到天才的理论直观以外，还能看到这种后退（即退回到低于马克思主义对一切哲学意识形态的批判的水平）的例子？”

“但是，列宁在阐述这个论点时，把话说过了头。他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需要有为实践充当基础的‘理论’，而他阐述的那个论点实际上却指的是理论，也就是一般实践的理论，即唯物辩证法。”

“列宁自己就曾经责备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从外部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科学的‘例子’。从外部硬搬概念的做法从来不能和理论实践划等号。硬搬的概念除了名称以外丝毫改变不了它是外来的真理的性质，这种做法对取得这一名称的真理不能起任何作用。例如，把辩证法的

‘法则’应用于物理学的某项成果就不是理论实践；这对物理学的理论实践的结构和发展不但不能改变一丝一路，更糟的是，这还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桎梏。”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到，‘颠倒’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把一种意识形态‘颠倒过来’，是得不出一种科学的。谁如果要得到科学，就有一个条件，即要抛弃意识形态以为能接触到实在的那个领域，即要抛弃自己的意识形态总问题（它的基本概念的有机前提以及它的大部分基本概念），从而‘改弦易辙’，在一个全新的科学总问题中确立新理论的活动。”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故意‘卖弄’黑格尔的表达方式，用以教训当时的‘愚蠢’哲学。我们今天难道也该受这一番教训吗？”

“所谓把黑格尔的哲学（或辩证法）‘颠倒过来’、使之‘重新用脚立地’这个著名论题实际上就贯穿着这种逻辑；因为，说到底，如果问题的确仅仅是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过来，那么事物的颠倒显然并不会因简单的位置移动而改变本质和内容！用头着地的人，转过来用脚走路，总是同一个人！”

“我不久前在一篇论述青年马克思的文章里曾经指出，所谓‘对黑格尔的颠倒’在概念上是含糊不清的。我觉得，这个说法严格地讲对费尔巴哈完全合适，因为他的确重新使‘思辨哲学用脚站地’（不过，费尔巴哈根据严格的逻辑推理，从这次颠倒中只得出了唯心主义的人本学）。但是，这种说法不适用于马克思，至少不适用于已脱离了‘人本学’阶段的马克思。”

“我们接着又看到，这种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下是无用的，恰恰因为它用头立地（用观念而不是用真实立地）：‘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这个提法显然是不确切的，但正是这种不确切才说明了困难在什么地方。我们还注意到恩格斯关于任何哲学家都必须建立一个体系的奇怪断言：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

《政治与历史：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

“同样，巴黎公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也在实践上证明了恩格斯理论的错误，他认为无产阶级有可能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框架内夺取政权，等等。”

《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因而列宁从中得出了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叙述方法的一些——在我看来有误的——结论。《资本论》确实（错误地）宣布了马克思是从‘最简单的事物’、从社会的最小‘细胞’开始，也就是从商品开始。”

“反映论，就其客观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原则而言是正确的，但就哲学理由而言则太简短了。”

“当列宁宣称一切认识都起源于感觉时，他也是处于马克思的同一路线上。我们最多只能责备他稍稍落后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者谈到的不是感觉，而是人类‘感性实践的活动’。”

“不幸的是，我们发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表达了同样的观念：辩证法的本质是运动，运动是物质的真正特质，因而存在就是运动着的物质，这就是我们可以同时谈论存在的规律（唯物主义）和运动的规律（辩证法）的理由！如果从字面上、从‘规律’这一科学范畴出发来理解，辩证法的规律——尽管列宁也有一两次脱口而出提到它（但我们一定要不惮于改正它）——这一观念，准确地说是荒谬的：它声称要创立但实际上是恢复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要对唯心主义存在论作出回应，就应该存在唯物主义存在论，后者要提供关于存在的规律（唯物论）和关于存在的运动的规律，即关于其变化的规律，既客观又主观的辩证法的规律（吕西安·塞夫），因此它涵盖了所有问题，也就是说，涵盖了所有想象中的困难——我的意思是对手的困难。”

“没有辩证法的规律，只有辩证的论点。辩证法属于哲学，不提供对其对象的伪规律的认识，

只陈述论点。通过一个困难我们就可以看到，断言存在着辩证法的规律的企图是多么荒谬，这个困难就是辩证法规律的数量难以统计。”

“哲学史上一直像谜一样存在的一个事实，正是由此最终得到澄清，这个事实就是：哲学以体系的形式存在。虽然不是全部哲学，但绝大多数哲学是这样的。恩格斯在这个难题上说了些蠢话——这证明唯物主义者永远不可能彻底不受唯心主义侵袭——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说，哲学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四。这关系到矛盾，他说得对；但是提到‘人类精神的矛盾’，这就唯心主义了。”

“因此马克思在现有的哲学中思考，他并没有创立一种新哲学。他只是以一种革命的方式实践现有的哲学，从中采纳一些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立场的论点。但如果事情确实如此，我们就有理由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一种哲学，无论它是古代的、中世纪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哲学，都要求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即体系性。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要有这种体系性：为了支持对范畴进行统一的工作，而那些范畴是用来帮助实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统一。”

“然而我们可以说，这种体系性的形式，正如恩格斯关于运动中的物质的不幸尝试和其他不断重复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陷阱。”

《怎么办？》：

“而且——如果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一个显著标记——这就是葛兰西为什么不断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那两个乖谬的（因为是唯心主义的）句子的理由：‘一种生产方式，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和‘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对阶级斗争的条件和形式加以认识的诸原则——和（为了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糟糕的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区分。”

《列宁和哲学》：

“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个参照系的存在，一旦我们搞懂了它结构上的逻辑，我们就可以把列宁在理论上的各种提法统统新释为这个逻辑的结果，包括他为了用经验主义的范畴术语来反对经验主义而对其做出的不可思议的曲解。”

“说到底，尽管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合作时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天才，但他的思想却无法与列宁的相比。通常他只是做到把论点一并提出，而不是致力于思考它们在相互关系中的统一性。更糟的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摆脱掉《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的某种实证论主题。”

“恩格斯试图这样做，但就算我们准备不按字面去理解他（对于一个不是专家的人，至少可以这样要求），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他在漏掉某种根本性的东西。”

《哲学的改造》：

“斯大林为此进一步曲解了恩格斯关于‘物质与运动’之类不幸的命题，并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某种可以通过物质来理解各种哲学论点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或形而上学。”

《今日马克思主义》：

“这些主题的或隐或显的唯心主义不仅出没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名副其实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而且出没于1859年《序言》的进化论（诸生产方式的‘演进’交替）和在葛兰西喜爱的名言中同义反复着的终极目的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同样的唯心主义以远为狡猾的形式出没于《资本论》本身。”

“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致使马克思陷入从对价值的抽象出发这个自设的圈套中去的那些困境和矛盾。这里仅举两例：生产资料在被劳动力运用过程中实现的价值的保存/转移这个棘手的问题；或者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马克思在那里被一条有缺陷的推理线索绊住了手脚——好像人们没有必要回过头去更进一步地理

解问题似的。”

“《资本论》中最意味深长的含糊其辞便是明证，在这些地方，‘异化’继续出没在关于拜物教理论、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生产条件对工人的支配、以及共产主义图景的文本之间。异化：一个旧词，一个旧的、无所不适的、唯心主义的概念，显然是在思考着别的什么东西——某种不被思考的，并且一直就那样存在着的東西。”

“是列宁在受到激烈攻击的时候才不明智的写道 ‘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 ”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观点看仍停留在马克思的阶段，或不如说停留在他的某些缺点中，也是一个令人诧异的悖论。”

《相遇唯物主义的潜流》：

“为了使事情简单明朗，让我这么说吧，这是一种相遇唯物主义，因而是一种有关随机性和偶然性的唯物主义，它作为彻底不同的一种思维模式，与各种有据可循的唯物主义大异其趣，后者包括归之于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那种唯物主义——它们像理性主义传统内的其他唯物主义一样，是必然性的和目的论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说，是被改造过了的，乔装改扮了的唯心主义。”

“从这一曲解出发，唯心主义的解释大获全胜，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卢克莱修所说的偏离还是其全部哲学，还是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和霍布斯、写作《第二论文》的卢梭、马克思，甚至还有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触及这个问题的范围内）。在这些阐释当中取得凯旋的是这样一种哲学观念和哲学史，我们可以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将这种哲学观念和哲学史称为西方的——因为它自希腊人开始就掌握着我们的命运；称为逻各斯中心论的——因为它将哲学视为逻各斯的一种运动，这种运动被认定是对支配一切现实的终极意义优先性的思考。”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不知疲倦地重演了马克思的幻觉，虽在思考着无产阶级的再生产却错误地认为他们在思考无产阶级之生产；虽在既定事实中思考却相信他们在事实的形成过程之中思考。马克思那里有很多东西能将我们引向这种错误，只要他还屈服于有关生产方式的另一种观念：总体化的、目的论的和哲学的观念。”

“在马克思这里，不存在有关所谓商业生产方式的令人满意的理论，*a fortiori* [更有理由说] 也不存在有关商业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的令人满意的理论，与此相应的是，在马克思那里也不存在有关资产阶级的令人满意的理论——当然，除非马克思出于排除难题的目的而过度使用‘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仿佛一个形容词就能代表纯粹否定性的概念似的。”

《来日方长》：

“我们用柏拉图与黑格尔的真理，对比一下马克思无主体无目的的实践，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实践没有真理。实践不是真理的替代物，也不想创造一种不可动摇的哲学。相反，它动摇了所有哲学，它不是哲学。哲学谈论物质，谈论阶级斗争的事业，但它能做的事情很少。实践却能做到哲学做不到的事。它不仅动摇了哲学，它还让我们看清了哲学的局限。”

“海德格尔本人，的确是在只谈到现象学的时候（但为什么只是现象学呢？真是神秘），就说它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曾批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句名言‘问题不再是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指出与这种提法相反，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想要干预世界历史的进程，或是为了改变世界，或是为了使世界倒退，或是为了保存并加强世界的现存形式，以防被认为是危险的改变的威胁。”

“拉康是从精神分析实践的观点说的，而我是从哲学实践的观点说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而如果我要始终坚持自己对经典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我就不能让其中的一个压倒另一个，既不能让哲学的领域压倒精神分析的领域，反之亦然，也更不能让哲学实践压倒某一门科学实践，反之亦然。这就使我们两人都言之成理，尽管我们谁都没有认清我们分歧的根源。”

“‘不自欺欺人’，这个提法在我看来始终是惟一的关于唯物主义的定义；而通过‘自己思

考’（马克思重述的康德的话），我试图使马克思的思想对一切真诚的、有理论需要的读者来说变得明晰而严密。当然，这样便使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叙述有了一种特殊的形式，因此有许多专家和战士都感觉我制造了一个自己的马克思，与真正的马克思大相径庭，是想像的马克思主义（雷蒙·阿隆）。这一点我愿意承认，因为我的确为马克思清除了所有那些在我看来不仅与他的唯物主义原则不相容、而且是靠了意识形态才在他那里继续存在的东西：首先是那些护教论的‘辩证法’范畴，甚至是辩证法本身；我觉得这种辩证法通过那些著名的‘规律’，只能在事后为党的领导人的决策充当历史偶然进程中的既成事实的辩护词（证明无罪）。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我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象，的确在许多方面纠正了马克思在字面上表达的思想，这为我招来了那些受到马克思表达方式严格束缚的人们的无数攻击。是的，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如何为马克思制造了一种与庸俗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哲学；但由于这样的哲学给读者提供了严密的、可以理解的、不再自相矛盾的阐述，我想我就达到了目标，我通过重新赋予他对论述的严密和可理解性的需要而‘拥有’了马克思。”

“大概就是这一点在当时为许多青年‘打开’了如此崭新的前景：我们可以按照这种关于马克思的新表述进行思考，而完全不放弃对论述的严密和可理解性的需要；于是我们可以帮助马克思，也帮助我们大家，比他本人更好地主宰他自己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理所当然地受制于他的时代的理论束缚（也受制于这些理论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因此，我们可以真正使马克思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内部引起的一场小小的‘知识’革命。但我认为，我们的对手所指责的，与其说是我们的荒唐革新，还真不如说是这个打算本身：为了使马克思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思想来理解，我们需要摆脱马克思的文学性。实际上，马克思对于他们来说，即便在其谬误的方面，都始终是一个神圣的人物，是不容非议的老父亲、创始人。我呢，本来就不喜欢什么神圣的父亲，而且的确从很长时间以来，便确信父亲只不过是父亲，本身是个可疑的、不可能扮演其角色的人物；既然我习惯并酷爱扮演‘父亲的父亲’，所以，这种站在他的地位、把他本来若想成为自己就必须思考的事情拿来思考的举动，对我倒是非常合适的。”

“我不知道人类是否有一天会达到共产主义，这个马克思的末世论图景。但我所知道的仅仅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说的这种不可避免的过渡——乃是‘茅屎坑’，正如我1978年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面对听众所声称的，当时他们都被我的过火言词搞得不知所措。”

“可我却从来没有攻击过托洛茨基，并对他深表敬意”

“巴丢目前在马斯佩罗出版一套有趣的书，奇怪的是，我们从中又可以发现萨特的造反哲学，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这种哲学，在唯意志论、实用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伟大领袖思想中典型的唯心主义的背景下，他用这种哲学阐释了毛泽东的文本。”

“然而，如果说马克思真的建立了一门科学，那么这门科学就像每门科学那样，即使不作修正，至少也应该有所修补，使其原则更加稳固，其结论更加确切——这一简单的想法也许会有丰硕的成果。它将大大简化一部著作，马克思曾在同样的错觉中相信这部著作也会像在每门科学中那样，‘万事开头难’，然而这是错误的：需要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篇作出修正，好几年前我就让人们注意这一点了；尤其需要仔细地地区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和在他那些读书笔记式的草稿——如‘剩余价值理论’——写下的东西，在后者中，他常常满足于照抄不误，例如照抄斯密关于生产劳动者的文本，这种理论和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是不同的，而且已经从《资本论》中消失了。”

《论青年马克思的演变》：

“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可以在恩格斯和列宁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的形式（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里头找得到。可是这一老书本身包含着唯心主义观念（潮流的来源和内在性等等）的‘来源’的隐喻，不一定会使我们陷入错误。”

《李森科：未完结的历史》：

“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占主导的观点，把唯物主义变成一种被认为是由辩证法来表达其‘规律’的物质的本体论，这种观点也抵死不承认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全部价值在于它们不是陈述‘规律’，而是陈述论点。”

《论偶然唯物主义》：

“最终它们在那里一直呆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这个天才的男人正在构造一种自列宁以来还没有先例的对内、对外政治，就像中国一样，建立一种全新的新经济政策（NEP）——并（事情还不清楚）希望重建被斯大林以令人想起原始积累历史（马克思）的种种方法残酷摧毁了的俄罗斯农民生活。”

《〈资本论〉的对象》：

“更确切地说，上面所说的回答是这样一个回答，马克思在这个回答中断言，他‘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回答是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特殊区别问题（未出现的问题）的回答。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回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的回答一样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两种回答都包含了内在的缺陷：人们只要对颠倒这一比喻提出问题就可以认识到，这种比喻不能思考自身，它指出了它自身之外的一个现实问题，一个现实的但又是未出现的问题，同时指出了自身中的与这种不出现相应的概念的空虚或模糊，也就是指出了在词后面的概念的空缺。”

“这个令人吃惊的回答（其论证是平庸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种误解的善意的评论，而马克思的敌人对这种误解却作出恶意的解释。恩格斯用近似理论（这种理论以抽象的近似性质来说明概念作为概念与它的对象的不一致性）回避了施密特的‘有针对性的’反对意见。这个回答并没有击中要害：实际上价值规律的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和他的对象完全一致的，因为这个概念是一个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概念，因而是一个具有各种不一致形式的一致概念，而绝不是一个像原罪那样会影响由人的抽象所产生的一切概念的不一致的概念。因此，恩格斯根据经验主义的认识理论把恰恰表现出马克思的一致性概念的理论力量的东西当做由概念产生的缺陷。”

“在许多地方，马克思本人的明确的表述隐约地表现出这种连续性的假设，或者更确切地说，伴随着马克思的明确表述无意地出现的某些沉默包含着这种连续性的假设。在某些时候，在某些表现出征候的地方，这种沉默本身在论述中突然出现，并且迫使这种论述不自觉地像闪电一样产生出真正的但是在字面上却是看不见的理论上的缺陷：有些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似乎包含在思想的必然性之中，有些判断由于错误的论证，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可以在理性面前开拓的领域消失了。”

“很遗憾，这两段文字没有留下任何歧义，因为它们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误解’的地方并提出了有关的概念。在这里，关于误解的所有人物都出场了，每个人物都扮演着由人们期待的戏剧效果所规定的角色。我们只需改变这些人物的位置就可以使他们担任新的角色，放弃旧的角色，从而开始说出完全不同的台词。这一论断的全部误解实际上就在于这样一种荒谬推理，这种推理把概念的理论发展同现实历史的起源混淆了。但是马克思却把这两种次序仔细地加以区别。他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在科学论证表述中出现的各个环节的次序同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个环节的次序之间不能建立任何对应关系。但是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这种不可能的对应关系，他毫不迟疑地把‘逻辑的’发展同‘历史的’发展等同起来并且诚实地向我们指出了这种等同所要求的理论可能性的条件：这两种发展次序的同一性的确立就在于一切历史理论所必须的概念就其实体来说都是由现实对象的特性规定的。”

“我作肯定的回答，是因为虽然恩格斯对这个理论事件即这场科学革命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但是他没有以同样的魄力从理论的对象的角度来思考这场革命的后果。在对恩格斯来说是

常清楚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指出他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而所有这些含混不清都可以归结为经验主义地把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混为一谈。”

“我们甚至要感谢马克思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弱点、空缺和疏忽：这些弱点、空缺和疏忽有助于说明他的伟大，因为我们只能在重新开始他的逝世所中断的叙述时，才能提到它们。”

《帝国主义论稿》：

“不过，列宁本人并没有背离马克思。在《怎么办？》的一页上，我相信在那里，他说，他赞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因为每一门科学不得被纠正，因为每一门科学都是‘无限的’，并且因此必须以必然不完美的公式作为开端，一个人，要沿着[道路]走下去，就必须了解如何纠正。而他引用了梅林（一个我想唤回其名字的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纠正某个马克思不确切的断语的例子（大概是关于历史的断语）。列宁说：梅林纠正马克思是对的，因为他是在一切可能的科学的措施下这样做的。鉴于此列宁反对伯恩斯坦的伪修正，那只是向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堕落。因此，列宁辨认出了一条原则（引用梅林的例子），为了保持其作为科学的生命，由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必须得到纠正。否则它将不再是科学，而是被剥夺了科学等级的公式与处方的集合。然而列宁，用帝国主义理论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人，从来不纠正马克思的一条公式，在宣称这些公式是不准确的，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要纠正它们[的同时]。”

“列宁本人，写道，纠正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驳）这个或那个点错误，以及必然的错误是一种正常状态，因为尽管他是一个天才，马克思只是一个人，一个奠定了一门新科学的基础的人，他身处为了创立[这门科学]必须使自己从中解放出来的意识形态，很有可能停留在某些错误的观点，以及部分的，错误——列宁本人并不应用他清晰的原则。他借用马克思来表述自己。他崇敬地理解了[马克思]。但没有任何改变他的重要[观点]。如果说他抛弃了这个或那个对他而言显然是赘余或错误的哲学范畴，列宁没有更正任何马克思的科学概念，没有更正任何马克思的科学工作的科学成果。而如果列宁不允许他自己这种大胆，或者不如说，因为我们不能说这一情况是一种大胆，这一简单的权利，让我们甚至说这一对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的义务，我们应当对继承者们说些什么呢！”

“因为自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以来已经过去超过一百年了。超过一百年来阅读它，清理它的难题，和纠正他不可避免的误差（有哪一个，对所有这些创立一门科学的科学家而言，谁不曾在开启他的伟大工作的时候说出过一些蠢话呢？）。”

“对其余的人，他们并不愿意费半分力气去纠正马克思的一个公式，[增添]任何多于他们原先拥有的东西；而如果某个人冒险做了这件事，他们就立马警惕起来。的确，他们没有像伯恩斯坦那样‘修正’马克思的危险（其他的人用另一种方式对待这件事）。然而，他们也不承担起任何责任去纠正马克思犯错的地方或者他的用词含混的地方或者他的公式不是最优的地方，如列宁同意我们应当这样做的那样[去纠正马克思]。”

“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的著名说法（唉，这太著名了），生产关系是‘决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人’在‘他们的存在的社会生产’的场合进入这种关系。我不想讨论这个公式（以及它的译文！），它有它的优点，但它的缺点像马克思给我们这唯一的能够反思的公式一样，紧紧盘绕在我们理论参照物的天空之中。”

《论历史》：

“与黑格尔、恩格斯和斯大林思考相反，按照马克思的思考，不存在历史的规律。”

《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仅举一例，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中，我们所说的‘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只能理解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下，属于封建生产方式的要素（城市手工业）或其分解（农村手工业）的结合所产生的阶级效应。也可以说——列宁在这一点上纠正了马

克思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在他 19 世纪 50 年代的历史著作中）——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的产物，而是封建生产方式遗留下来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融为一体的产物。”

《黑母牛：想象的访谈》：

“毛泽东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还在继续，而且是在工人阶级的党内继续。第一个论点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论点（只要有一个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表明有阶级，因此有阶级斗争，即使它的形式，如目前在苏联和中国，很难阐明，因为与我们知道的资本主义下的形式相比，它们是全新的）。第二个论点并不完全准确。毫无疑问，最终，阶级斗争也会在党内产生影响，但在我看来，是以‘非对抗性的形式’，以‘非对抗性’矛盾的形式，也就是说，以不是阶级矛盾的矛盾的形式，因为它们有助于统一工人阶级，尽管它们代表了工人阶级体验其统一的矛盾形式。”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政治经济学恰恰只有在掩盖阶级和阶级斗争时才能被看作是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它的意识形态任务就是掩盖和勾销。因而，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政治经济学（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外，它的目的是再明确不过的），关键的事实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论再生产》：

“再重申一遍，问题不在于[指责]马克思写下了几行特别含糊不清的文字，甚至还出版了它们（然而他却没有出版其他更可疑的文本，比如《1844 年手稿》或甚至《德意志意识形态》）。因为，《资本论》虽然在字面上还有一些（但为数不多）不当的提法，但在其精神实质的最深处，它是彻头彻尾反黑格尔主义的。”